

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CERQ-C)的信效度研究

朱熊兆¹, 罗伏生¹, 姚树桥¹, Randy P. Auerbach², John R. Z. Abela²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医学心理中心,湖南长沙410011; 2.加拿大McGill大学心理学系)

【摘要】 目的:评估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本(CERQ-C)的信效度及其在中国大学生中的使用。方法:用CERQ-C对523个大学生施测。一个月以后从原样本中随机抽取100个样本重测。结果:全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1,9个分量表的 α 系数在0.48到0.91之间;全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56,9个分量表的重测信度在0.36到0.69之间;全量表的条目间平均相关系数为0.10,9个分量表的条目间平均相关系数在0.19到0.71之间,验证性因子分析各指标:CFI(0.981),IFI(0.981),TLI(0.977),RMSEA(0.062)均符合测量学要求,支持量表九因素模型的理论构想。结论:CERQ-C具有合适的信度和效度,是评估情绪调节认知策略的可靠工具。

【关键词】 认知情绪调节; 信度; 效度

中图分类号: R39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611(2007)02-0121-04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Chinese Version

ZHU Xiong-zhao, LUO Fu-sheng, YAO Shu-qiao, Randy P. Auerbach, John R. Z. Abela

The Medic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enter,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CERQ-C). Methods: The CERQ-C was administrated to 523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one month later, the CERQ-C was randomly readministered to a subset of the original sample (n=100). Results: The Cronbach's alpha coefficient for the total scale was 0.81 and for the nine subscales ranged from 0.48 to 0.91; The mean inter-item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for the CERQ-C was 0.10, and the mean inter-item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for the nine subscale ranged from 0.19 to 0.71. The test-retest reliability coefficient for the total scale was 0.56 and for the nine subscales ranged from 0.36 to 0.69; Indices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such as CFI(0.981) IFI(0.981) TLI(0.977) RMSEA(0.062) all meet the standard of psychometrics and supported the original CERQ-C structural hypothesis of nine factors model. Conclusion: The CERQ-C is a reliable and valid assessment of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Key words】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Cognitive coping; Reliability; Validity

个体“为实现目标,而对其情绪反应的发生、体验与表达进行监控、评估和修正的内在与外在过程^[1]”被称为情绪调节。良好的情绪调节使个体最大限度地发挥情绪在情境中的适应动力性,促进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不适当的情绪调节有可能使情绪陷入困境,破坏人际关系,阻碍社会适应和身体健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随之发生转变,情绪调节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日显重要。

综观以往对情绪调节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发现,多数情绪调节理论的研究者主要通过测评情绪调节策略来探索影响个体情绪调节的因素。但现有的情绪调节策略测评工具多数从应对的功能角度出发,分问题指向应对和情绪指向应对2个维度来测评人们情绪调节的基本策略,如Folkman和Lazarus编制的“Ways of Coping Questionnaire”(WCQ)^[2,3]、Endler和Paker编制的“the Coping Inventory for Stress Situations”(CISS)^[4,5]、Carver等编制的“Coping

Inventory (COPE)^[6]等。有学者认为,使用使用问题指向应对和情绪指向应对2个维度无法充分解释个体应对的复杂性和多样性^[7],因此有必要关注应对的子类型,如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研究证实,对情境的认知评价可以直接引起情绪体验并调节情绪^[8]。

以往有关情绪调节策略的问卷虽有所涉及认知策略,但大多数测评工具,把认知和行为策略放在一起考察。Garnifski等认为,认知和行为应对策略划分在同一个维度,很难确定这些认知应对策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负性情绪的调节。为确切了解情绪调节认知策略对负性情绪的影响,有必要把认知应对或者认知成分的情绪调节策略从其他维度的应对策略中分离出来,综合考虑多个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心理健康的关系^[9]。

基于从纯认知角度来考察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方式)的个体差异这样一个理论构想,Garnifski在综合以往情绪应对理论的相关文献后,编制了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ERQ,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9]。在制定认知情绪调节问卷时,把个

【基金项目】 中南大学文理研究基金资助(项目编号:0601012)

通讯作者:姚树桥

体在遭遇负性生活事件后使用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分为 9 类: 自我责难, 责难他人, 沉思, 灾难化, 接受, 积极重新关注, 重新关注计划, 积极重新评价, 理性分析。系列研究表明, CERQ 是一个测量认知情绪调节的可靠而有效的问卷, 且能很好评估 12 岁以上的个体在遭遇负性生活事件后使用的情绪调节认知策略^[9-11]。

目前国内研究者使用的情绪调节策略的测评工具多是应对方式问卷, 没有专门的工具测量情绪调节认知策略。本研究的目的是制订一个认知情绪调节问卷的中文版本 (CERQ-C), 对其信效度进行检验, 并研究其在中国人群的适用性。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被试来自湖南 2 所普通大学, 有效样本 523 个, 其中女生占 54.9%, 男生占 45.1%, 91% 为汉族学生。年龄: 17 岁到 24 岁, 平均年龄 20 岁 7 个月。男女年龄无显著性差异 ($P > 0.05$)。在所有第一次参与的学生中, 随机抽取 100 个参与问卷的第二次跟踪测量, 有效样本 96 个学生。

目前有关 CERQ 的应用研究, 只有美国的一个研究采用大学生为样本^[12], 故为比较中国大学生与国外大学生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差异, 本研究拟采用美国大学生样本作为比较样本。该样本的平均年龄为 20 岁 6 个月, 基本与本研究样本匹配。

1.2 研究方法

1.2.1 施测程序 采用集体测试。在进行第一次测量前, 所有参加测试的大学生都签署了知情同意书。第一次测量时, 学生填答人口学资料, CERQ-C 以及情感与焦虑症状问卷-简式 (MASQ-SF)^[13]。每个教室由 2 个研究者组织整个测试过程并收集问卷。一个月后重新测量。

1.2.2 工具 认知情绪调节问卷, 英文版由 McGill 大学 Ablea 教授提供。问卷采用先翻译再回译的方法, 最后 2 名双语翻译者比较翻译和回译的差别并作出解释, 在精确用词的基础上确定形成一个 CERQ-C 最终版本。共 36 个条目, 包括 9 个分量表: 自我责难、接受、沉思、积极重新关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理性分析、灾难化、责难他人。每个分量表 4 个条目。在某个分量表上得分越高, 被试就越有可能在面临负性事件时使用这个特定的认知策略。抑郁和焦虑症状问卷, 本研究采用情感与焦虑症状问卷-简式 (MASQ-SF) 来测评抑郁和焦

虑症状, 该问卷为自我报告式问卷。抑郁症状分量表包括: 一般性抑郁症状分量表 (GDD) 和快感缺乏抑郁分量表 (AD)。焦虑症状量表包括: 一般性焦虑症状分量表 (GDA) 和焦虑唤醒分量表 (AA)。

1.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12.0 统计软件包和 AMOS5.0 进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CERQ-C 测量结果的基本统计

2.1.1 性别差异比较 对男女样本进行单因素多变量方差分析以比较性别差异。结果表明, 在大学生中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没有发现显著性别差异。见表 1。

表 1 CERQ-C 及其分量表的均数和标准差比较 ($\bar{x} \pm s$)

	所有样本(n=523)	男(n=236)	女(n=287)	F-test
责难自己	12.84±1.89	12.98±2.12	12.72±1.67	2.48
接受	12.28±2.94	12.30±3.02	12.27±2.88	0.02
沉思	11.98±2.67	12.16±2.77	11.83±2.59	2.04
积极重新关注	11.92±2.48	11.84±2.63	11.98±2.35	0.41
重新关注计划	12.48±3.57	12.54±3.51	12.43±3.62	0.12
积极重新评价	12.40±3.54	12.52±3.50	12.31±3.57	0.45
理性分析	11.69±2.33	11.53±2.53	11.82±2.16	1.99
灾难化	8.52±2.58	8.53±2.57	8.52±2.59	0.00
责难他人	10.26±2.30	10.36±2.33	10.18±2.27	0.86
总量表	104.37±11.67	104.77±11.59	104.05±11.72	0.49

2.1.2 中外大学生样本比较 中国样本与标准样本 (美国大学生/非临床) 的均数与标准差比较见表 2, 单样本 t 检验的结果表明, 男性样本在“自我责难”, “积极重新关注” 2 个分量表上中国样本得分要高于标准样本, 相反“接受”, “重新关注计划”, “积极重新评价”, “理性分析”, “灾难化” 5 个量表上中国样本得分要低, 而在“沉思”和“责难他人”, 这 2 个分量表上, 2 个样本的得分没有显著差异。女性样本在“自我责难”和“责难他人” 2 个分量表上中国样本得分要高于标准样本, 而其他 7 个分量表上得分要低于美国样本。

2.2 信度

2.2.1 Cronbach's 系数 总量表 系数为 0.81, 9 个分量表的 系数在 0.48 (理性分析) 到 0.89 (积极重新评价) 之间。见表 3。

2.2.2 条目间平均相关系数 CERQ-C 的条目间平均相关系数见表 3, 9 个分量表的条目间平均相关系数在 0.19 (理性分析) 到 0.71 (重新关注计划) 之间。

2.2.3 重测信度 如表 3 所示, CERQ-C 的重测信度 0.65, 9 个分量表的重测信度在 0.36 (沉思) 到 0.69 (积极重新评价) 之间。

表2 CERQ-C 中国样本与美国样本的比较

分量表	男			女		
	中国 (n=232)	美国 (n=286)	t 值	中国 (n=285)	美国 (n=76)	t 值
自我责难	12.98 ± 2.12	12.36 ± 2.04	4.48*	12.72 ± 1.67	12.25 ± 2.63	4.74*
接受	12.30 ± 3.02	13.01 ± 2.67	-3.59*	12.27 ± 2.88	13.37 ± 2.47	-6.48*
沉思	12.16 ± 2.77	12.13 ± 2.82	0.17	11.83 ± 2.59	13.13 ± 2.69	-8.53*
积极重新关注	11.84 ± 2.63	11.38 ± 2.93	2.68*	11.98 ± 2.35	12.26 ± 2.69	-2.03*
重新关注计划	12.54 ± 3.51	13.37 ± 2.56	-3.62*	12.43 ± 3.62	14.29 ± 2.62	-8.70*
积极重新评价	12.52 ± 3.50	14.07 ± 3.24	-6.80*	12.31 ± 3.57	15.16 ± 2.88	-13.50*
理性分析	11.53 ± 2.53	13.87 ± 2.78	-14.23*	11.82 ± 2.16	14.35 ± 2.86	-19.90*
灾难化	8.53 ± 2.57	9.71 ± 2.50	-7.08*	8.52 ± 2.59	10.45 ± 3.02	-12.64*
责难他人	10.36 ± 2.33	10.46 ± 2.54	-0.63	10.18 ± 2.27	9.78 ± 2.58	2.97*

注: *P<0.05, 下同。

表3 CERQ-C α系数, 重测信度, 条目间相关系数

	α 系数 (n=525)	条目间 相关系数	重测信度 r(n=96)
责难自己	0.55	0.25	0.57*
接受	0.66	0.29	0.40*
沉思	0.72	0.39	0.36*
积极重新关注	0.76	0.44	0.38*
重新关注计划	0.91	0.71	0.50*
积极重新评价	0.89	0.67	0.69*
理性分析	0.48	0.19	0.38*
灾难化	0.82	0.53	0.65*
责难他人	0.77	0.46	0.51*
总量表	0.81	0.10	0.56*

2.3 效度

2.3.1 量表与各因子的相关系数 如表4所示, 9个分量表与整个量表的相关系数, 在0.13(理性分析)到0.69(积极重新评价)之间。各个因子间的相关系数在0.00(理性分析-责难他人)到0.78(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之间。

表4 CERQ-C 各分量表的 Person 相关

量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 责难自己	-									
2 接受	0.08	-								
3 沉思	0.31*	-0.04	-							
4 积极重新关注	0.07	0.13*	0.12*	-						
5 重新关注计划	0.08	0.55*	0.01	0.19*	-					
6 积极重新评价	0.06	0.59*	0.02	0.25*	0.78*	-				
7 理性分析	0.10*	-0.17*	0.11*	0.11*	-0.20*	-0.16*	-			
8 灾难化	0.20*	-0.02	0.36*	0.01	-0.07	-0.13*	0.07	-		
9 责难他人	0.09*	0.04	0.18*	0.05	-0.02	-0.02	0.00	0.36*	-	
10 总量表	0.39*	0.60*	0.44*	0.45*	0.68*	0.69*	0.13*	0.36*	0.34*	-

表5 CERQ-C 各分量表与焦虑和抑郁症状的偏相关

	抑郁		焦虑	
	r	pr	r	pr
责难自己	0.18*	0.14*	0.22*	0.12*
接受	0.19*	0.23*	0.02	0.04
沉思	0.08	-0.02	0.30*	0.17*
积极重新关注	-0.15*	-0.16*	0.04	0.02
重新关注计划	0.03	0.01	-0.03	-0.02
积极重新评价	-0.04	-0.11*	-0.04	-0.02
理性分析	-0.13*	-0.13*	0.00	-0.06
灾难化	0.32*	0.27*	0.33*	-0.06
责难他人	0.13*	0.01	0.19*	0.07

2.3.3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以最大似然法作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九因子模型的拟合情况, 结果显示:

2.3.2 量表各因子与焦虑和抑郁症状的相关分析 如表5所示, 在考虑某个认知策略与抑郁症状的相关时, 若不考虑各个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相互作用, 以下4个认知策略与抑郁症状呈正性相关: 自我责难, 接受, 灾难化, 责难他人; 而积极重新关注和理性分析2个认知策略与抑郁症状呈负相关; 在控制其他8个认知策略的影响后, 自我责难、接受、灾难化3个认知策略仍与抑郁症状呈正性显著相关, 而积极重新评价, 积极重新关注和理性分析3个认知策略与抑郁症状呈负相关。同样在考虑某个认知策略与焦虑症状的相关时, 若不考虑各个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相互作用, 以下4个认知策略分量表与焦虑症状呈正性显著: 自我责难、沉思、灾难化、责难他人; 如果控制其他8个认知策略的影响后, 自我责难、接受、灾难化3个认知策略仍与焦虑症状呈正性显著相关。

各个指数符合测量学标准 (CFI=0.981, TLI=0.977, IFI=0.981, RMSEA=0.062)。

3 讨论

3.1 CERQ-C 的基本得分情况分析

CERQ在西方国家的研究使用中发现, 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存在性别差异, 但本研究在大学生样本中没有发现类似结果, 这有待在以后的研究中采用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群样本去证实。

Triandis曾指出, 文化能影响个体使用的应对方

式,在不同文化结构的社会中,人们会以不同的方式体验与表达情绪,也会因不同的动机而控制其情绪的体验与表达^[14]。本研究同时发现,同年龄阶段的中国样本与标准样本在不同的认知策略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也许同样可以考虑由文化背景的差异来解释。但是哪些特定的文化因素影响个体应对策略的使用以及如何影响这些应对策略的使用功效需要有大样本的跨文化研究结果来证实,这是笔者以后的研究应该探讨的问题。

3.2 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CERQ-C的内部一致性较好。虽有3个分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较低,但是总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较高(0.81)。CERQ-C的条目间相关系数在Briggs和Cheek推荐的范围之内^[15],符合测量学要求。CERQ-C的重测信度为0.56,各个分量表的重测信度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提示认知策略属于有个体差异但相对稳定的变量。

CERQ-C的9个因子的相关系数在弱(责难他人-理性分析,0.00),到适中(积极重新评价-重新关注计划,0.78)之间,提示各个分量表有相关但不相同;与Garnefski的研究结果一致,积极重新关注和积极重新评价具有较高的相关性,都是强调个体在应对负性事件时从事事的积极面去改变认知。但是有些理论上认为是适应性的认知策略并不全都与非适应性策略呈负性相关(积极重新关注与沉思),说明从理论上把某个认知策略视为适应性(积极性)或非适应性(消极性)认知策略是不合适的,认知策略具有情境的可变性以及个体应对偏好的差异。CERQ-C与焦虑和抑郁症状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个体使用的消极性认知方式(如,自我责难,灾难化)的使用频率越高,报告的焦虑和抑郁水平也就越高。另外,个体报告使用积极性认知策略(如“积极重新评价”)的频率越少,报告的抑郁水平也越高。与原始量表的理论设想相反,个体在应对负性生活事件时使用“接受”这个认知策略的个体的频率越高,抑郁水平也愈高,而以往的研究提示,接受是一个适应性的应对策略^[9,10],这提示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不但存在情境的可变性,而且可能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中存在差异。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个体把改变应激性事件的结果看作一种个人能力的体现,故接受现实的个体有更多的负性情绪体验。但这个结果在以后的研究需要再次检验。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原始的九因素模型能获得较好的拟合指数,说明CERQ-C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量表中理性分析这个因子的信度

比较低,在以后的研究中使用,应注意这个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设计所采用的都是自我报告式问卷,对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以及焦虑和抑郁症状的评定都是在自我评定的基础上得出的,可能在焦虑和抑郁症状程度的评定上存在不足或者过度等偏差。另外,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面研究方法,由于情绪的不稳定性与认知的相对稳定性,可能会影响到认知应对策略对负性情绪的预测作用。将来的研究要考虑纵向设计,以便进一步检验认知应对策略与情绪调节的关系。

参 考 文 献

- 1 Thompson RA. Emotion regulation: A theme in search of definition. In N. A. Fox, The development of emotion regulation: biological and behavioral considera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onographs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59, Serial No. 240). I. Evaluating the convergent and discriminant validity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ymptom scale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994, 25-52
- 2 Lazarus RS, Folkman S. Transactional theory and research on emotion and coping.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78, 1: 141-1692
- 3 Folkman S, Lazarus RS. Appraisal, coping, health status,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6, 50: 571-579
- 4 Endler NS, Parker JDA. Multidimensional assessment of coping: a critical evalu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0, 58: 844-854
- 5 Endler NS, Parker JDA. Assessment of multidimensional coping: task, emotion and avoidance strategies.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1994, 6: 50-60
- 6 Carver CS, Scheier MF, Weintraub JK. Assessing coping strategies: A theoretically based approac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8, 56: 267-283
- 7 Compas BE, Connor-Smith JK, Saltzman H, et al. Coping with stress during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Problems, progress, and potential in theory and research. *Psychol. Bull.*, 2001, 127: 87-127
- 8 Mandler G. Constructivist theory of emotion. In: L. Stein, B. Leventhal, and T. Trabasso. *Psychological and biological approaches to emotion*. Hillsdale, NJ: Erlbaum, 1990. 21-43
- 9 Garnefski N, Kraaij V, Spinhoven Ph. Negative life events,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and emotional problem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1, 30: 1311-1327
- 10 Garnefski N, Teerds J, Kraaij V, Legerstee J, et al.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2.3 同质性信度

修订后问卷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57, 各因子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01~0.929。

2.4 复测信度

随机抽取该医院的 55 名护士作为重测对象, 间隔 1 周后进行了重测。前后两次测试的总问卷分的相关系数为 0.877, 5 个因子的重测相关系数为 0.746~0.866, 均达到 0.01 的显著性水平。

3 讨 论

对于工作压力源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做了很多的探讨。凯瑞·库伯通过对别人及自己的研究结果进行分析整理, 提出引起工作压力的 6 种因素包括: 工作条件、角色压力、人际关系因素、职业发展因素、组织结构因素、家庭工作相互影响因素^[6]。赵然对于中国护士压力源量表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护士压力源共有 5 个维度: 护理专业及工作性质、护理工作量及时间分配、工作环境及资源、护理病人专业技术、护士与病人及家属的人际关系、护理管理及医护人际关系^[3]。本研究初步修订的护士工作压力源量表仍然为 5 个因子结构, 但 5 个因子命名与所包含的条目与原量表不完全一致, 如从原量表的第 1

个维度护理专业及工作方面分离出了社会地位与职业发展方面的维度, 这一点更接近以往研究者以及凯瑞·库伯对于工作压力源研究的理论构想; 将原量表的第 2 个维度工作量及时间分配方面、第 3 个维度工作环境及资源方面, 以及第 1 个维度的某些条目整合为一个维度, 即工作环境和性质维度; 将原量表中的第 4 个维度“病人护理方面的问题”中的 11 个条目基本分成了明显的两个维度, 即本研究的因子 3 病人及家属的态度方面和因子 4 专业技能方面的压力源, 这一点与赵然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原作者、赵然以及本研究对于护理人员工作压力源研究比较一致的结构维度为管理及人际关系维度。

参 考 文 献

- 刘玉馥, 周莉. 护士压力研究进展. 国外医学护理学分册, 1998, 17(1): 3
- 李小妹, 刘彦君. 护士工作压力源及工作疲溃感的调查研究. 中华护理杂志, 2000, 35(11): 645-649
- 赵然, 方晓义. 护士工作压力、A 型人格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5, 13(2): 153-155
-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等.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1999. 235-258
- 石林, 古丽娜. 压力与健康, 2003
- (收稿日期: 2006-08-22)
- (上接第 124 页)
- Differences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4, 36: 267-276
- Garnefski N, Kraaij V.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ive specific sample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6, 40: 1659-1669
- Ryan CM, Eric RD.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in the prediction of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and anger.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5, 39: 1249-1260
- (上接第 128 页)
- Hewitt PL, Flett GL. Perfectionism in the self and social contexts: Conceptualization, assessment, and association with psychopatholog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1, 60(2): 456-470
- Price B. A model for body image care.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1990, 15: 585-593
- Claudia Maria Ramos Medeiros Souto, MN, RN, and Telma Ribeiro Garcia, DNSc, RN. Construction and Validation of a Body Image Rating Scale: A Preliminary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Terminologies and Classifications*, 2002, 13(4): 117-126
- Marsh HW. The structure of academic self-concept: The Marsh/Shavelson mode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90, 82: 623-636
- 杨宏飞. 目标追求的入世、出世心理测评初探. *心理科学*, 2006, 29(2): 395-398, 388
- 汪向东.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9. 31-35
- 崔红, 王登峰. 中国人人格形容词评定量表(QZPAS)的信度、效度与常模. *心理科学*, 2004, 27(1): 31-33
- 汪向东.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9. 194-196, 235-236, 318-320, 244
- Diener E, Emmons RA, Larsen RJ, Griffin S.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49: 71-75
- 刘孝群, 耿德英. 大学生学习动机与学习成绩的相关研究.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17(2): 75-77
- 路红, 祁禄. 性别、抑郁、自尊与体像评价: 关于大学生体像的调查研究. *西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41(5): 98-102
- (收稿日期: 2006-07-18)